



在宋书中远离互联网 从方物间寻找桃花源

晓 渔

《知中·了不起的宋版书》



罗威尔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当今世界昂贵的收藏书籍之一,“宋版书”是中国造纸术、印刷术以及宋代文化的历史见证。本书以图文并茂形式引领读者从“宋版书”视角管窥宋朝人的生活状态和美学追求,向读者呈现有关宋代印刷业和中国古代出版历史风貌。

本书凭借严谨的史料考证和丰富的实用知识,试图为读者带来富含人文情怀的阅读体验。从宋代印刷出版的“宋版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印刷史开始梳理,内容涵盖中国传统印刷术、造纸术、书籍版式与装帧、书籍美学、字体、校勘学、古籍善本鉴赏与收藏等方面,特别邀请清木活字印刷手艺继承人邱恒勇、书籍设计师吕敬人、字体设计师厉向晨、古籍修复师朱煜、清代宫廷善本书籍“天禄琳琅”研究专家刘蕾、日本字体设计师今田欣一等多位中外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力求多角度呈现中国传统书籍的美学与历史。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美]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刘畅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移动互联已经深度浸入我们生活的今天,上网几乎成为很多人每天“规定动作”。然而,很少有人统计过,日常上网时间中,多大比例是在消磨,多大比例是用于学习、创造或关注社会。如今的现代人,真的能彻底隔绝网络,逃离虚拟社交么?网络是否把现代都市人变成电子僵尸?我们将来的回忆录是否只能是上网的浏览记录?电脑文件归档也成了现代民间艺术?试想一下,如果你不自拍、不发微信朋友圈,还能找回真正的自我吗?这一切都是网络给人的全新思考。

本书作者戈德史密斯是美国知名概念艺术家,他认为,上网绝非浪费时间,而是创造性的活动。书中他以跨学科角度、散文式语言进行论证,涉及大众传播学、计算机、心理学,以及电影、现代艺术和文学诗歌等领域,从宏观和微观层面 8 个视角,试图给读者阐述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香港方物志(珍藏版)》



叶灵凤 著
商务印书馆

香港既有都市的繁华也有乡郊的宁静。然很少有人留意其素雅的一面,考察其风土人情。本书开风气之先,以香港方物为主题,作者将香港的鸟兽虫鱼和掌故风俗,以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的全新视角记录和传递,融知识与情趣于一体,读来自然亲切。在香港回归 20 周年的今天,在“博物热”兴起当下,这本首版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跨时空之作重新以照片加手绘的方式再度呈现,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不免追忆香港过往的容颜。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香港史地知识出版物匮乏,尤其关于香港方物的记载几乎空白,叶先生此书弥补这一缺憾。自 1958 年繁体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多年来香港和内地数家出版机构多次重印;被誉为“香港学”开山之作,唯一全面介绍香港方物的博物志;更被誉为自然科学、历史民俗与人文情怀相融合的经典读物。本书是香港回归 20 周年纪念版,首次加入大量珍贵实拍及手绘图。

《寻找桃花源》



卫毅 著
鹭江出版社

“寻找桃花源”是隐喻。在作者看来,每个人都希望找到安身立命的理想之地或精神归宿——“桃花源”。书中,作者笔触穿行于不同时空、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探索那些“寻找桃花源”的故事。时间跨度从当下到十年前,再到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故事中的人生生活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等地,有乡村教育志愿者、幸存者、农民工、艺术家、学者、作家、导演、商人等。与之平行的还有作者和家人的故事。

不同声音汇集,不同命运交织。作者试图呈现各种气象万千的人生,勾勒出国人百年冷暖悲欢的图景。作家阎连科认为,这是一部用“复调”叙述的非虚构作品。作者将受访者世界与自己世界打通,使得“他们”的现实和“他”的现实交织、构筑为一个多声部世界,他在倾听同时,用个人形式发出独有的声音。

开卷

格非对话李洱：

先锋作家回归传统的启示

本报记者 周有强

格非身体向后,自然靠在沙发上。这位 2015 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身穿黑色夹克,一头银发,语锋锐利。从艾略特到鲁迅,从杜甫到卡夫卡,说起文学,他旁征博引又逻辑严密,显示出清华大学教授的本色。

与之相比,他左手边的李洱更喜欢从一个小故事切入,继而展开自己的论述。作为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大多数时候他身体朝右倾斜。因为前几天陪儿子打球拉伤了肌肉,坐姿显得有些别扭。

现代性给写作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小说有哪些传统?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存在怎样的关系?写作者该如何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10 月 21 日,北京永定门公园,两位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就“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的问题,对话了 3 个多小时。

现代性让写作变得艰难

参加本次对话的前一天,李洱去盲人按摩店做了一个按摩。

给他按摩的小姑娘告诉他,她正在听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因为很少有作家写盲人的生活,她一遍又一遍反复听。当李洱询问她的“阅读”感受时,这个小姑娘说,她觉得“这部小说像是四五十年前的作品”。

李洱问她为什么这么觉得。小姑娘给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现在的盲人会发微信、聊 QQ,会遇到盲道被占用等日常困境,但她在毕飞宇的小说里没有看到这些内容。而这部小说出版时间是在 2011 年,也不过 6 年前。

“一个作家已经倾尽全力去表现现代生活了,可

读者不满意,认为这个作品落伍了。”李洱说,因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让现代写作变得异常困难。一个作家原本计划写一部预言小说,很可能写着写着就成了现实主义小说,而等到小说出版时可能就成了历史小说了。

格非认为,现代性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塑了社会。在时间范畴,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在现代,时间成了金钱和效率的代名词;在空间上,过去的人“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而现在,全球化的进程让不同的文化互相交织。这些不仅让现代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也对作家的表达构成了挑战。

“作家所有的努力是在词与物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李洱说,现代性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外来语言的传入,让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把握,作家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对于词与物关系的认知。

以杜甫《春望》为例,在古代,当人们看到“城春草木深”中的“城”字时,头脑里想像出来的是荒凉的城墙,诗人的词与具体所指的物是有直接联系的。但在现代社会,读者们想到更多的是城市和城镇,对这句诗并不能产生直观感知。而当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将“城春草木深”中的“城”译成“广场和街道”后,由于它和当代的日常生活经验对应起来,诗句意象通过翻译反而被再次激活了。

回归传统的写作

现代社会急剧变迁的同时,格非和李洱却在而立之年各自经历了向传统回归。

30 岁之前,格非“狂读西方的书”,着迷于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技法,以反叛传

统、先锋作家态度登上文坛。30 岁之后,他却开始系统大量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用了 10 年时间去了解传统文化。

李洱也是如此。他说,35 岁之前他更多是靠敏感和直觉写作。35 岁之后他发现自己与传统联系更紧密了。之前难以触动他的《红楼梦》,35 岁时突然变得异常有魅力。

这是为什么呢?格非觉得,自己的转变受到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艾略特的极大影响。艾略特认为,一个年轻作家在年轻时怎么写都可以,但到了 30 岁,如果还要继续写作的话,就必须去了解历史。“在我快 30 岁时,艾略特的话在我耳边,对我构成了持续压力”。

在艾略特看来,传统是一个结构,任何一个新作家都必须跟这个传统构成一种关系。李洱举例说,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人们往往认为他的诗主要是来自他的才华和灵感,但事实上,李白对整个文学史也非常熟悉。

“你们这代作家,余华也好,你也好。如果要出大作家,从现在就应该开始研究传统,再迟就来不及了。”快 30 岁时,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对他说的一段话,格非至今记忆犹新。

在过去,一个写作者光凭经验就能成为好作家;但现在,如果作家没有学历和学识,可能就缺乏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判断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这时候,一个作家就需要从传统资源中汲取营养,去发现变化中的不变之处。

“与传统对话才是继承传统”

在格非看来,中国小说有两个传统——古典文



地铁里的书香

近日,北京地铁 6 号线车厢内,在周围人大都低头看手机时,一名小女孩在专注阅读纸质儿童书。

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已习惯了电子阅读,纸质阅读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少见。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没有文化的润泽,不过一把壶而已。说白了,沧桑才是最大的资本,砂壶如此,人亦如此。”

忽然想起一件听来的事儿:一个喜欢收藏的人偶然在农家看到一把砂壶,细细把看,砂壶闪着时光的包浆,散发着岁月的沉香,收藏爱好者凭着丰富的经验断定这是一把难得的砂壶,有珍贵的灵性,但身上当时没带多少钱,全拿出来给主人,做了买砂壶的定金。几天后,收藏者带着余款兴冲冲地来到农家,接过砂壶的瞬间傻了,壶上的包浆不见了,壶里的茶锈也没了踪迹。原来,主人想,人家花那么多钱买一把旧砂壶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心好意地用铁刷子把砂壶里里外外刷洗得干干净净。收藏者捧着面目一新的砂壶,欲哭无泪,之后扬手把砂壶摔在了地上。失去了包浆与茶锈的砂壶,与平常的砂壶一般无二,因为它已没有了岁月的洗涤、润泽与冲泡中洗练而成的独一无二的灵性。

尘世喧嚣繁杂,马先生留心着生活中那些闪着灵光的点点滴滴,用散淡的文字打量纷纷攘攘的日子,坐在属于他的桥边,面对生命的河流,回顾来路,用轻松的心慰洗风尘。于是,他的文字也如风过摇竹,有了温度,有了灵感。

灵是寻常世俗的温暖,存在于感知;灵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存在于万物。于是,万物有灵。

学的“大传统”和五四以来受现代性影响的“小传统”。在全世界生活方式越来越同质化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关系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因为文学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呈现经验。

那么,现代作家如何继承传统呢?格非认为,继承传统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照搬旧的形式,不是再用杜甫的方式写诗,也不是用史记的语言写作。“只有在创造性的工作中才称得上是继承传统。”格非说,也许你写作采用的形式不是杜甫的,但你理解了杜甫为什么写作,了解了他的精神内核,那你仍然跟杜甫构成了关系,“与传统对话,这才是继承传统”。

李洱举了个例子。网络上有很多人续写《红楼梦》,那些续集无论是语言、情调还是风格,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他认为,这些写作都是无效的,“因为当你叫他们写一部关于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时,他们要么写不出,要么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创作中与传统对话。”

格非表示,继承中国传统并不是要抛弃外来传统。相反,写作永远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应该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进程中。

作为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格非曾在课堂上问学生,鲁迅和莫言在城市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在乡村的时间,可为什么他们的小说关注的都是乡村而不是城市?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格非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比较就没有发现。正是因为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才能回过头去发现农村与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莫言一辈子都待在农村,可能他的经验就呈现不出来了。”“保持他者的在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岛屿之书》：

书写独立的人生姿态

宋 杨

一座岛屿如何形成的呢?《岛屿之书》中这样写道:

“出海的渔家首先发现了孤悬海外的岛,登岛后,发现荒草萋萋可过人,不见人迹,在岛上步行一天就能横穿而过。岛虽小,却河流密布,水声处处。他甚至听到了渔夫们的欢呼。于是,岛上船来船往,有了人烟。新来的人当中,自然少不了避世的隐居者,有逃荒的难民,有没落的王孙,更有金盆洗手的强盗……多年以后,他们的后代都变成渔夫,在海水光顾之夜,他们丝毫不会惊慌,全然忘记他们的来历——海鸟为他们安置了新的身份。”

于是乎,一段前所未见的岛屿传奇就此开启。

因书写海洋文化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盛文强继海盗、海怪、渔具话题之后,再次着笔于他自小成长的岛屿之上,将多年来对无名海岛的探访经历,以及复杂多样的海岸文化形态的感触,在《岛屿之书》之中徐徐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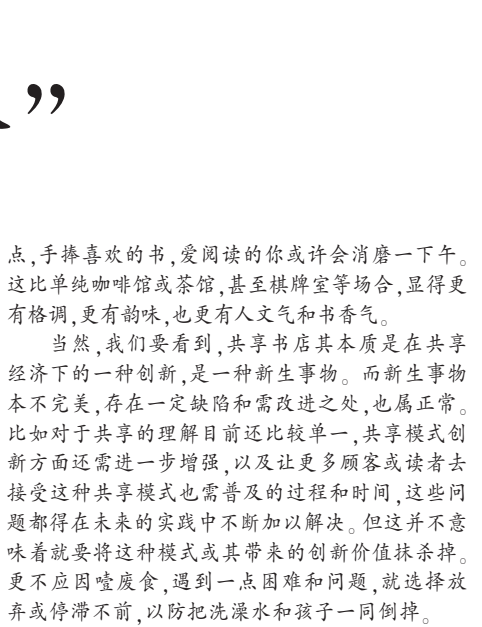
从某种角度说,岛屿有着最大限度的文学潜能。弹丸之地,现实的荒谬反而会被无限地放大,带上诗般的魔性;而这种特性,被自小成长在海岛的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并书写下来。

所以,在一位岛上少年的回忆中,即使是最日常的绳结,也另有一番景象。绳结的高手有超乎寻常的目光,“他盯住一个线头,便可瞬间看清他在绳索堆里的行走路线,用目光疾走一遍并把它从迷途中搭救出来,团为柔顺的一盘。”绳结的无数可能性竟然成为世界丰富性的隐喻。

岛屿提供给岛上少年的,是一种对于世界模型的想象。只是在作者冷静的观察之中,充满了秘密和危险。于是“风翻滚在帆板上”“船头敲破了岸线”“一场近乎疯狂的远航之旅正在酝酿”。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坦言,他的写作“得益于岛屿的环境”,岛屿可以说是他写作的一个原点。岛屿虽边缘远僻,所要面对的却是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变化无常的海上风云。处于独立姿态的培养和对未知热情的保持并无益处。作者笔下岛屿上的各种风物,均带着一股清奇魔幻的风致,文字的背后孕育着一种远离权威、界限之外的勃勃生机。在书中,这座岛被架购在古籍文本、个人体验、家族秘史、乡野传奇等彼此交结的空间中,在一种陌生又不至于惊喜的文字体验中迂回成形。

岛屿的空间虽小,却足可成为文学的样本。岛屿是纷繁世事的镜象,也是个体精神冒险之地——在微缩景观里,有人谋划着疯狂的海外之行,传奇的履历源自血液里的躁动。也有人默不作声地藏匿,内心深处却满怀着逃离尘世的喜悦。



点,手捧喜欢的书,爱阅读的你或许会消磨一下午。这比单地咖啡馆或茶馆,甚至棋牌室等场合,显得更有格调,更有韵味,也更有人文气和书香气。

当然,我们要看到,共享书店其本质是在共享经济下的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本不完善,存在一定缺陷和需改进之处,也属正常。比如对于共享的理解目前还比较单一,共享模式创新方面还需进一步增强,以及让更多顾客或读者去接受这种共享模式也需普及的过程和时间,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将这种模式或其带来的创新价值抹杀掉。更不应因噎废食,遇到一点困难和问题,就选择放弃或停滞不前,以防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掉。

是个首要问题。

这一质疑乍看之下似乎很有道理,甚至有些苦口婆心劝人踏实上进的意思。但细究之下,却是理念层面的一种固守或者因循传统。这种共享书店

的模式本就是传统书店面对当下新的传播语境和共享经济而做出的一种转型尝试,可谓拥抱新变化的积极创新。

植根于当下互联网与物联网深度融合基础之上的共享经济,其理念与实践正在深刻改变着今天人们的生活,包括阅读以及购书的情境和体验。

在这样足不出户即可实现“购买全球”的生活场景下,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和购书体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们的购书渠道、购书情境以及对于阅读的理解和阅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们对于买书以及阅读的体验,完全颠覆了传统。

在这种阅读和购买体验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背景下,注意力本身就可以带来效益,愿意关注就意味着可能为之买单。因此,应运而生的共享书店模式,当然首先需要吸引读者或顾客的眼球。而如果没有

王 瑜

号称“全球首家共享书店”的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正式成为共享书店至今已满百日。7 月 16 日,其正式开启 24 小时营业的“共享书店”模式。这一消息甚至被写进今年山东高考作文题。由此引发该书店成为“网红”,一度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

坦白讲,共享书店这种模式,或者说共享书店创新意义和创新启示毋庸置疑。这从书店成立至今以来,各地相继掀起的共享书店热潮即可看出,搭着共享经济顺风车大潮,而做出的创新尝试,确实具有某种示范效应。

然而,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抛开其中的积极意义或创新启示先不说,争议中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很具代表性,那就是认为书店的本质,本应是卖书而非作为公益图书馆。这种共享书店模式以借书为主,甚至是以招揽顾客或者吸引顾客注意力为主的一种经营模式能否持续,如何实现真正盈利